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在贵州领导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贵州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在贵州建立了20多个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活动。

繁星点点，如炬闪耀。中共赤水特支发动赤水兵工厂工人、学生、城市进步青年上街示威游行和宣传抗日，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同时声援东北义勇军。动员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支持开设进步书店之江书店。还选派党团员打入国民党军阀内部，领导赤水兵工厂大罢工、从事策反活动、进行武装暴动等。

中共黔桂边委从广西移驻贵州贞丰的板陈村（今属望谟），领导黔桂边区革命活动，先后建立蛮瓦支部、卡法支部、丰（贞丰）业（乐业）支部、荔波支部、翁昂支部等。这些党组织在开展农民起义和统战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动员应征青年入伍赴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毕节支部加强领导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积极进行组建革命武装的活动。

抗战期间的1934年5月至1936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沿途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号召、组织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日反蒋。

1935年1月，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成立，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省工委在配合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的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宣传抗日主张，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至死不屈，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奋起抗击。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团结全省人民抗日的中坚力量，党的建设也得到加强。

信仰如炬，烽火征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7年7月，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省学联）成立，通过宣传品、读书会、讲演会、歌咏队、话剧等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奋起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的开端。

1938年2月，中共贵州省工委重新组建，逐步恢复和发展全省各地党组织。“临难不苟免”“至死不屈服”的信念写进了当时省工委的文件，指导全省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

自1938年至1940年4月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期间，全省共恢复和建立党组织32个，其中县级以上组织14个。全省党员人数，由抗战前的150余人发展到了500余人。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组织条件，有力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及邻省党组织也指派人员在贵州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隐蔽活动，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其中，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中国红十字会特别支部、中共筑中支部、中共绥



贵阳沙驼话剧社部分社员合影。贵州省博物馆 供图

最广泛的动员，持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贵州地方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用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抗日进步力量，组织领导了有一切爱国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信仰如炬，光芒万丈。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吸引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通过组织抗日文化团体、创办进步刊物等方式，团结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抗日斗争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有效地组织各族群众积极参加公路、铁路、机场等修筑，使后方的物资资源不断运到前线，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保障战时物资供给。

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对贵州各项工作的领导，担负起与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及全国红十字会总会、贵州企业公司等秘密党支部和地下党员的联系。南方局在贵阳建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为抗战前线运送了大批军需物资，转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家属和爱国青年到延安和新四军。

贵阳沙驼话剧社、贵州“民先”第一队、贵阳青光话剧团等举行义卖公演，组织捐赠抗战物资。开展义卖宣传活动，农民们将农产品义卖，并把所得收入寄给《新华日报》社，开展抗日宣传和慰劳前线军队的活动，并派人到前方参加战地服务。

抗日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省各地。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在黔南、黔东南等地，发动农民组建民间武装力量，开展军事训练。黔南事变发生后，组织发动独山、荔波等地民间武装力量袭扰日军后勤线，延缓其推进速度。保障西南交通线安全，支持前线物资运输，维护贵州抗战大后方的相对稳定。中共贵州地方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不仅直接打击了日伪势力，还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大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贵州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参与抗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障战时物资供给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决策咨询处处长朱仁印话语铿锵。

专访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贵州省社科联副主席余福仁 用生命诠释“一寸山河一寸血”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蔚

下党的领导机构。省工委一方面配合中央红军的斗争，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宣传抗日主张，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记者：贵州抗日救国军是红军长征期间建立的省级抗日武装，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余福仁：1936年2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时，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毕节地下党掌握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并请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毕节爱国人士周素园担任司令，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委员、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邓止戈任参谋长。红二、红六军团派李国斌、廖明、欧阳崇俊分别担任三个支队政委，还协调一批红军干部充任各支队。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组织毕节各界人士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抗日救国团等民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军北上抗日后，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编入红军随军北上，第二支队后来编入八路军。周素园随第二支队长征到达延安，毛泽东曾写信赞扬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第一、第三支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解放。

记者：在您的梳理中，有哪些贵州人的抗战事迹令您印象深刻？

余福仁：中央红军长征中转战贵州近130天，仅遵义地区就有5400余人加入红军。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近3个月，其中在毕节扩红5000余人。这些贵州人相当部分牺牲在长征路上，但也有不少编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中。

牺牲在敌后抗日战场上的贵州籍红军战士和奔赴延安的贵州热血青年令人敬佩：普定人杨经国，1942年在冀中反“扫荡”中率部突围时阵亡；遵义人胡畏，1943年在河北阜平县小水峪突围中阵亡；普安人罗会廉，1944年在蒙城县阵亡；遵义人陈淑蓉，1943年在冀东根据地转移途中被俘后惨遭日军杀害；思南人肖炳焜，1942年在山西辽县十字岭突围中阵亡；清镇人王少武，1942年在陕西七亘村阵亡；毕节人刘仁，1943年在华北战场负重伤后被日军活埋……他们在前线与日军血肉相搏，奋勇作战，用生命诠释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烈。



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 资料图片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省涌现出一些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和抗战中一以贯之的领导力和组织力，也为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和视角。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贵州省社科联副主席余福仁。

记者：贵州是红军长征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红军在贵州活动期间，也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贵州抗战和长征有哪些关联和交集？

余福仁：1934年5月至1936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贵州，途经60多个县（市、区、特区）先后建立黔东、黔北、黔西北根据地，还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等武装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发动贵州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日反蒋，挽救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危机。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林青赶赴遵义，通过在上海结识的吴亮平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罗迈代表党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省工委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里的罗迈（李维汉）雕塑。 资料图片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 陈曦 摄



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里的林青雕塑。 资料图片

中共贵州省委：汇聚抗战力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曦

2025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黔剧《无字碑》又将登上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舞台。

这部大型红色革命题材剧目，以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林青为创作原型，塑造了在贵州隐蔽战线上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带领观众重温烽火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贵州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党的活动不断扩大，贵州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摆脱了分散、自发的状态，朝着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发展。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占领遵义，贵州地下党代表林青赶赴遵义，向党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党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建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的党的领导机构。

中共贵州省委建立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有力支持了红军长征。同时，中共贵州省工委根据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进步力量，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凯里等地建立县委、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

在中共贵州党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国民党贵州当局1935年在贵阳制造了镇压共产党人的“一·七”事件，致使建立仅半年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遭受重大损失，年仅24岁的林青牺牲。七一九事件后，中共贵州省工委及时召开秘密会议，总结教训，擦干血

泪继续斗争。此后，贵州各级党组织活动更加分散，斗争更加隐蔽，为今后的革命斗争保留了火种。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中共贵州省工委。1938年2月新成立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领导全省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全省党的组织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据统计，1938年至1940年4月，全省共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32个，其中县级以上组织14个。全省党员人数，由抗战前的150余人发展到了500余人。

“这一时期，贵州中共组织的建设发展很快，特别是在贵阳，党的活动十分活跃。”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眉说，整个抗战期间，贵阳先后建立了22个党支部。

中共贵州省工委逐步建立健全全省各地党组织，成为团结全省人民抗日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开展。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民先”贵州地方队部等各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会等文艺团体积极以艺术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全省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在贵州高原镌刻了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抗战印迹。

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1940年4月，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中共贵州省工委撤销，建立贵州省临时工委，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6字方针。

隐蔽下来的党组织及党员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巧妙、富有成效的斗争，揭露和挫败了敌人的一次次阴谋，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